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



〔日〕山田敬三 著

鲁迅世界

山东人民出版社

0.97

据大修馆书店一九七七年初版
《鲁迅の世界》译出

鲁 迅 世 界

〔日〕山田敬三著
韩贞全 武殿勋 译
周 坚 夫 校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178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

书号 10099·1626 定价 0.70元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的形成

走向新世界——求学时代	1
一 旧家的没落	3
二 南京求学	9
三 寄托《离骚》	15
四 民族风俗与梦	20
五 惜花	26
六 新小说	30
七 在小说界革命之下	35
文学和英雄系谱（上）——留学时代前期	44
一 《自题小像》	45
二 共和革命的主张	49
三 悲痛与愤怒	55
四 屈辱与悲哀	61
五 在沉默之中	68
文学和英雄系谱（下）——留学时代后期	75
一 《新生》的流产	75
二 浪漫派宣言	80
三 物质万能的否定	85
四 相会	90

五 最后的英雄像	95
在新旧夹缝中——教员时代	101
一 《域外小说集》	101
二 教员生活	105
三 在新旧夹缝中	109
从失败到“呐喊”——官吏时代	116
一 辛亥革命	116
二 反革命的进行	121
三 崩溃的梦	125
四 在寂寞之中	130
五 佛典的购入	134
六 “呐喊”前夜	139

第二章 鲁迅文学

葬送屈原——鲁迅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146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屈原形像	146
二 鲁迅的“楚辞观”	150
三 葬送屈原	154
鲁迅和“白桦派”作家	159
一 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	159
二 有岛武郎《与幼小者》	169
三 《壁下译丛》的白桦派	175
四 鲁迅所接受的“白桦派”作家	183
盗火者——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	195
一 俄国革命的远景	197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	201

三 革命时代的文学	206
四 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购置	211
五 卢那卡尔斯基与普列汉诺夫	215
六 文艺政策的位置	219
七 盗取火种的人	224

第三章 鲁迅世界

战后日本的鲁迅论	234
一 作为遗产的鲁迅论	234
二 寻求新的鲁迅形像	239
鲁迅和郭沫若——与九州大学的关系	244
一 鲁迅的场合	245
二 郭沫若的场合	246
三 鲁迅和郭沫若	248
四 与九州大学以及日本的关系	249
与创作诀别之时——作为分界线的“三·一八”事件	250
鲁迅世界——《野草》的存在主义	257
一 无为与沉默	257
二 深渊的描写	259
三 梦和彷徨	262
四 他所失去的东西	265
附录：鲁迅旧体诗《自题小像》的成立	268
原著后记	278
追记	283
译校后小记	284

第一章 鲁迅的形成

走向新世界——求学时代

有的人对他幼年时记事以来所经历的往事，哪怕是一桩只能使他感到痛苦的事实，但当他与其淡薄的记忆连在一起时，也会引起美好的回忆，从而能用他那只画笔勾绘出一副朦胧的轮廓。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其天赋的文笔细腻而生动地记录了当他的名字还叫樟寿，号为豫山、豫才时起，直到后来改名为树人去南京求学的这前后十几年的往事。这些记事有的成了短篇小说集《呐喊》的一部分。后来他进而以更概括的形式写成了我们所见到的自传式回忆小说《朝花夕拾》。

又由于他的富有文才比他小四岁的二弟周作人十分敬慕他，所以回忆鲁迅的轨迹，伴随着来自侧面的有力的傍证，从而构成了一幅不能比这更美的精密的立体图。关于抚育他的少年时代的“家”和“人”，有许多是周作人叙述的，关于那鲁迅自己微妙的心曲，则是由他本人亲自动笔追溯的。他

们兄弟二人对故乡的民俗都表现了强烈的关心。这些也都一并记载在自己依依难忘的忙于游戏时代的回忆记录中，而将中国江南地方的丰富的民俗资料流传到今日。

然而，对于无比迷恋鲁迅文学的我们来说，关心的是，从这些大量的资料中吸吮与形成鲁迅文学有关的其青少年时期的切身体验，从而挖掘出鲁迅文学的源泉。其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鲁迅自己来说话。

这里，我们想将所见到的资料综合起来重新加以组织和整理，以作为一个再度重现晚期鲁迅文学的契机。以鲁迅的回忆，其中也包括美好的部分作为强有力的线索，重新进行研究。还有他少年时期所吟咏过的习作旧体诗，虽然不成熟，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探讨的必要。奇怪的是，后者至今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提起将鲁迅的习作旧体诗介绍到日本的人，恐怕就是十几年前以东京的学生为中心的鲁迅研究会的成员。在他们所办的会刊上，只能说以试译的形式发表过唯一的一篇鸟瞰那些习作旧体诗的文章。

其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石川忠久的《鲁迅的旧体诗》，然而这是一篇试图“以现代的旧体诗的观点来认定鲁迅作为一个诗人”的短评，而不是展望整个鲁迅习作旧体诗的文章。何况该文“姑且不论鲁迅的本质”，更没有有机地考察后来鲁迅思想的形成过程。

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选定的旧体诗，也都是留学初期的《自题小像》以后的作品，并且主要以训读的方式来

介绍的。结果与其倾向不同的习作旧体诗搀杂不分。此外，高田淳的《鲁迅诗话》，理应为鲁迅旧体诗的专著，但不知为何，其所记述的内容大致也没有超出岩波版。

论鲁迅的文章虽然众多，但关于其习作旧体诗的专著，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死角。“在评论文章时，最好是通观全篇，并要注意作者的整个人格及其生活的社会状况。”大概我们没有忘记鲁迅的这番话吧！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是，根据鲁迅的叙述，重新组织了“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鲁迅直至前往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的见闻。后半部分特意增加了习作列举的比重，为的是在可能范围内更加接近鲁迅。

话虽然这样说，但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上述的愿望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是没有把握的。因此，书中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则不胜喜悦。

一 旧家的没落

绍兴是个水乡。在这个纵横都不过只有几公里的小市镇里，东西约有十条，南北也有五、六条河沟，河里灌满了水。春天，柳絮宛如绵雪。载着绍兴酒的船，蒙着一层柳絮，闪现着白光，从中缓慢地划过去。河与道路交叉处架有一座拱桥，船首好象歪着头从桥下通过。到了那时，辉映在嫩绿的叶子上的绯红色的桃花业已凋零了。

市镇的四周围着城墙。主要街道上铺满了饱经岁月的长条石。远在二千几百年前，自从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在这里建

都以来，绍兴便成了治理江南地方的中枢要地之一。自古以来，这里出了许多学者，在清朝考据学领域中，占有显著地位。被称为“江浙文人渊薮”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便是以绍兴为中心的。那些在考场上或仕途中失意的读书人家的子弟，作为幕友充当着地方长官的“秘书”之类的职务。这里就是所谓“绍兴师爷”的产地。

从城中心往南走，在一个叫做木莲巷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四面围绕着高墙。大门上雕饰着镂空的花纹，门的上部有似二层楼式的房屋，屋上长方形的小窗向着南面的道路开着。屋子的后面有个将近二亩地大的菜园，叫做“百草园”，那里成了孩子们常去玩的地方。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一带叫东陶坊，一般叫做东昌坊口。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地主家庭里。这个家族约有土地三十公顷（鲁迅的说法为四、五十亩）。一家三代十口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这规定产量（每亩平均九十公斤）的约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先祖中从几代前就有在科举中登第的人。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谥号介孚公）是一族中第一个考中最后阶段的殿试的进士。父亲周仪炳（伯宜公），数应乡试未中，只取得了一个生员（秀才）的资格。母亲的娘家姓鲁，外祖父晴轩公为突破乡试的举人。他的两个儿子，即鲁迅的两个舅父也都是“秀才”。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鲁迅自己作为周家——地主兼官僚，族中既有经营当铺的也有放高利贷的这种名符其实的旧家——的嗣子，为了科举，当然从幼时起就受了传统的应试的教育。久病的父亲伯宜公，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寄托在长子身上，可以说把近乎暴虐的严格的训练施加于鲁迅的故事，我们今天由《五猖会》的回忆中可以管见一斑了。如果没有家庭内部的变更，成人后的周树人，也许最多不过是一个旧体制的齿轮。

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命运的捉弄，在鲁迅刚刚记事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已日趋没落了。一八九三年二月，介孚公由于母亲（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从任职地的北京返回故乡，后因行贿纳官而被捕入狱。同年冬天，伯宜公又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与疾病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搏斗。这种接踵而来的不幸，终于使鲁迅一家陷入了困顿。这样一来，为鲁迅所订的以为一成不变的未来计划发生了重大变更。

在这之前的鲁迅，即使在周家一族之中也算是拥有相当权势的智兴房的一个前途有为的少爷。到安桥头外婆家去做客，也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或许是半客套的话，村里的老人们都夸奖他“将来一定要中状元”（《社戏》）。但是这个青年人一变之下，却被人们认为“乞食者”了。

然而，人们在遇到同样的环境或事件，由于他的立场、年龄、感受等不同，把它吸收进自己内心的方法，也会是截然不同地有着决定性的差异。鲁迅作为破落的旧家的长子不

得不到外婆家去暂时避难，却饱尝了苦涩，遭到了冷遇。但同样的生活对年少四岁的弟弟来说，甚至在回忆到那时是“极其愉快的”。

“总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极其愉快的。然而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那时稍有点发呆。”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避难》）

鲁迅将自己十二岁时的这段生活的回忆写进《呐喊·自序》中。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认为是影响他的人格形成的切身体验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探究的。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径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

鲁迅说，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这自然是指几年来由于祖父入狱和父亲医病而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负担所感到的痛苦而言。同时，周家也和许多书香门第一样，在同一宅邸内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多数家族之间，必须严格地遵守世代尊卑的秩序而过着世袭的丑恶的大家族制的生活。以致房系为祖先，鲁迅的第五代曾祖佩兰公为宗祖的几十名大家庭，以新台门为基地谋求生计，他们对外以强烈的同族意识而抱成一团。与此相反，在内部，随着复杂的生活上的纠纷而酿成了一种独特的气氛。这对今天习惯了各自为主的小家庭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沦落为没落的地主的长子鲁迅，处在这种环境中似乎更加悲惨。围绕着一族间的利

害关系，他受到来自长辈们的“不通情理”的威吓^①，因年长的妇女们所散布的流言蜚语而造成的困惑的虚构的插曲，鲁迅和周作人不知写了有多少。接着上述的引文，鲁迅是这样写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呐喊·自序》）

十九世纪末，即使对读书人家的子弟来说，用应试科举以外的方法而想出人头地，也是极其困难的。中日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基业已经根本动摇了。虽然亡羊补牢开设了几所洋学堂，但也不象科举那样为人们所重视和有权威，对合格者是不保障其将来前途的。因此，鲁迅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其父死后两年）志愿入江南水师学堂，并没有考虑自己将来的前途。在他就学仅仅七个月后，就接受了科举最初阶段的县试。从这件事本身来看，就可十分清楚地明了其间的一切情况。

鲁迅没有选择可以依靠的旧体制录用的道路，但却走上了当时读书人所避忌的“当兵的”学校的途程。关于这件事的理由，他自己在后来的《琐记》里作了如下的回忆：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

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是真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琐记》，一九二六年）

这样，鲁迅选择了“无须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然而这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其证据为：同族中有两名先于鲁迅升入该学堂的姓周的人，在应考时都改了名。后来成为鲁迅本名的“树人”二字，也是那时在水师学堂里担任古文兼管轮堂监督的椒生给起的。椒生是个道貌岸然的旧式的老夫子，是同族中比鲁迅长一辈的“举人”。

“水师学堂原有驾驶、管轮和鱼雷三个班，椒生是管轮堂的监督，大概先后已任职十年。周氏子弟中由于他的关系而进入那个学堂的共有四个人。最早的是诚房

的鸣山。原来的名字叫凤岐，椒生给改为行芳。那时学校刚刚开办，很受人们奚落，水师、陆师的学生则更加被人轻视，认为和当兵的没有什么两样。为此，读书人觉得没有用真名的价值，都适当地改了名敷衍暂时。”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椒生》）

周家第四个进入水师学堂的作人，认为鲁迅能在这里学习，其原因之一要归于椒生的功绩，说“如果椒生不在那里，（鲁迅）或许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到南京。”的确，有个亲戚在那里工作，鲁迅在南京求学就更容易一些。据说每当椒生休假回家时，鲁迅的母亲总是送给他一只炖鸡，“再三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和鲁迅的态度无关的。如以衍太太的谣言为契机，即使这是感觉性的东西——但对鲁迅逃出旧社会的意图却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当然，在他要离开绍兴城时是抱着憎恶和怨恨的，否则就无法理解“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为魔鬼”这类吐露真情的激昂的话。此后，鲁迅虽然几度谈及水师学堂的入学问题，但对那里有本族的椒生一事，却守口如瓶^②。椒生也希望鲁迅离开那里，因为那是旧世界的亡灵。

二 南京求学

父亲因不治之症在倾家之后离开了人间；祖父被捕入狱，为了解除死刑进行贿赂而把家财荡尽。携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们，为残酷的感受所开始苦恼的少年寿樟，在他寥

寥数行的回忆中，即表露无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

（《呐喊·自序》）

这就是在困顿中成长起来的周家少爷，于十三到十七岁时的多感的青年时期的前半期。这是一个由于贫穷而把人心弄得满是伤痕的极端的例子，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篇文章的。经济上的贫穷，不单是限于物质的困难，由于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则是别人所不会了解的，因而必须咬紧牙关，将苦衷深藏在内心里。鲁迅的感受则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他是否被人骂作“乞食者”，倒无关紧要。反正一家的没落这种无法防止的变故，给他过去的说是过于优越也并不夸张的平坦的人生道路带来了重大影响。踏过了这种经历，鲁迅终于决定“要到N进K学堂去了”。

但是，水师学堂对他来说仍是席不暇暖的地方。一星期中四整天英语、一整天古文、一整天做八股文，有时还要爬二十丈高的桅杆或练习游泳。高年级生走路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为了祭奠在池中淹死的学生，每年还放焰口，这是一个内容古老、名不符实的新式学校。对鲁迅说来是一处“总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象后来鲁迅所述的那样——

“乌烟瘴气”，即是说天日黑暗，宛如被毒气笼罩着一般。这样，需要九年时间毕业的管轮学堂，只有半年他就毅然脱离了。那年冬天，寒假时曾一度回到故乡。在家中住了一个月又返回南京。上述投考县试，就是这期间的事情。他虽然以总算过得去的成绩考中了，但却放弃了第二个月的府试。这是一次乍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举动，其原因直到现在鲁迅研究者们亦未得出结论。投考县试的唯一证人是周作人。如果把他死后发表的《知堂回忆录》和他早已发表过的《鲁迅的故家》以及《旧日记中的鲁迅》对照起来研究的话，那么鲁迅对应考的态度大体是可以明确的。首先让我们列举一下其前后有关的事项，年月日改换为公历：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某日	鲁迅归乡
十二月六日	应县试
十二月七日	四弟椿寿病危
十二月八日	四弟死去（五岁）
一八九九年一月五日	鲁迅离乡
一月十日	县试成绩公布（考中）
一月十三日	进行府试（由别人代考）
二月四日	府试成绩公布（考中）
十一月七日	院试（未应试）

根据周作人的记载，会稽县试应试者约五百人，其中突破府试及院试，而取得科举预备阶段生员（秀才）资格的只有四十人。在这年的县试中，周家有四人应试，椒生的两个儿

子伯文和仲翔分别以一六九号和二十四号考中，鲁迅是一三七号，周作人是四八四号，分别都获得了参加府试的资格。但是鲁迅在县试成绩发表（大案）之前已去南京。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不喜欢科举及第，不如认为他当时已决心离开水师学堂而要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去^③。后者的入学考试何时进行的问题已不能判明，但从周作人的记述^④来检证的话，至少应是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至于他特地投考县试，合格后为何又不应府试的原因这一点是不须深入探求的。因为与参加府试相比较，鲁迅则是把希望寄托于脱离水师学堂转到陆师学堂去。我认为这种看法较为合适。由于受同族人的怂恿，他的母亲已将替考人的钱都通融好了，在保证具有应试院试资格的情况下，鲁迅竟放弃了它。从这件事仍然可以证明，鲁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他个人愿望的。至于说起县试的应试，那只不过是应付一下家庭的要求而已。

一八九九年一月，年满十八岁的鲁迅，转入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里的学习给予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真正的求学时代，可以说是从这个学堂开始的。

“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